银川日报
08
2025年6月25日
星期三
责编/韩均 李振文
编辑/苏天
美编/孙辉
校对/宋辉 陈宗雄

品读银川 PINDU YINCHUAN 人文

石上生画，绘写动人宁夏故事

6月19日上午，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·优秀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初评（展览）活动在广州人民艺术中心隆重开幕。宁夏民间文艺家协会雕塑艺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、黄河石画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宋笑珍的作品，成为入围“山花奖”初评的5件宁夏作品之一。其代表作“宁夏21景”系列，巧妙利用石头纹理与质感，打破了传统的石头画理念。

本报记者 吴璇/文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结缘黄河石
从国画到非遗的艺术转向

在黄河边长大的宋笑珍，与黄河石的缘分始于童年捡石玩耍的经历。作为宁夏美术家协会会员，宋笑珍早年以花鸟山水国画创作闻名，却在偶然间被黄河石的天然纹理吸引——那些历经亿万年冲刷形成的石纹、石质与石缺，在她眼中是独一无二的“天然画布”。“我是黄河的女儿，石头里藏着母亲河的灵魂。”宋笑珍这样形容这份特殊的情感。

后来，宋笑珍开始尝试在黄河石上创作。初期，她将国画技法与石头特性结合，绘制花鸟鱼虫等题材，在艺术界广受好评，但后来她开始意识到，“本土文化才是艺术的根”。于是，宋笑珍转向以“宁夏21景”系列为代表的主题创作，耗时大半年完成的“宁夏21景”系列作品，不仅让宋笑珍成为黄河石画非遗代表性传承人，更入围了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项“山花奖”初评。“宁夏的贺兰山岩画、须弥山石窟，都应该在黄河石上活起来。”宋笑珍说。在一幅作品中，她将岩画的古朴线条、石窟的斑驳质感与石头的天然坑洼融合，让作品兼具历史厚重感与艺术冲击力。

宋笑珍说，与传统绘画不同，黄河石画的核心在于“依石创作”。国画是在空白的宣纸上构思，而她需要顺应石头的形状、纹路甚至残缺，将自然痕迹转化为作品的一部分。比如在创作“大漠星空”时，宋笑珍选用宁夏黄河滩的“黑金刚”石，利用其深邃底色与天然星点纹理，勾勒出了腾格里沙漠的浩瀚夜空。

1+7模式
非遗创新与文化赋能的实践

宋笑珍独创的“1+7模式”，是她深耕黄河石画的核心理念。其中，“1”代表黄河文化根基，“7”涵盖非遗传承、传统文化、艺术价值等多元维度。因为在宋笑珍的心中，黄河石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绘画载体，而是一种“文化的容器”。

在非遗传承层面，宋笑珍打破“石头画非科班出身”的局限，以专业功底重塑创作格局。她的作品既保留传统绘画技法，又融入现代设计思维。创作贺兰山文化系列时，宋笑珍将岩画中的羚羊形象与石头的天然线条结合，用矿物颜料模拟岩画的古朴质感，让千年岩画在石头上重生。这种“自然+创意”的模式，让她的作品成为宁夏文旅厅的展示藏品，并在“宁夏好礼”评选中获奖。

在文化赋能方面，宋笑珍将宁夏“十四五”规划中的产业元素融入了创作。在枸杞文化系列里，她用黄河石的暖黄色泽表现枸杞的饱满，将“黄河岸边枸杞香”的地域特色转化为立体艺术。在法治文化系列中，宋笑珍以31件作品构建了“信仰、底线、廉洁”的主题矩阵，用艺术语言诠释法治精神。“每个主题系列至少12件作品，这是对文化深度的探索。”宋笑珍的12个主题系列中，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”“贺兰山东麓葡萄酒文化”等，均已成为本土文化传播的鲜活样本。

市场与艺术的平衡，是宋笑珍的另一重探索。宋笑珍将作品分为“典藏级”与“文创级”。前者如“天地人合一”系列，结合百年根雕底座，成为博物馆级藏品。后者则开发吊坠、摆件等小物件，以“牡丹富贵”“苹果平安”等吉祥题材贴近百姓生活。“老百姓喜欢的，才是有生命力的。”宋笑珍的文创作品，既保证了艺术价值，又让非遗更加深入生活日常。

以上均为宋笑珍黄河石画作品。

宋笑珍。

坚守与创新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时代使命

“‘山花奖’是我终身的追求。”宋笑珍说，尽管此次“山花奖”的最终评审结果尚未揭晓，但通过在广州参展时与全国顶尖民间艺术家的交流，她更加确定了黄河石画的发展方向。“别人用画布，我用黄河石；别人画技法，我画文化。”正是这种独特性，让她的作品入围了此次“山花奖”的初评。

面对非遗传承的挑战，宋笑珍将“传帮带”视为己任。她不仅在贺兰文创基地开设工作坊，还开发“黄河石研学课程”，带领孩子们在石头上绘制作品。“我想让年轻人知道，黄河石不只是石头，更是会讲故事的文化载体。”同时，宋笑珍注重知识产权保护，每完成一件作品便申请版权，避免电脑复刻等侵权行为对非遗的伤害。

谈及未来，宋笑珍计划深入创作“贺兰山东麓葡萄酒文化”系列，用黄河石的纹理表现葡萄藤的虬劲与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的醇厚。“黄河石画要走出去，不仅靠艺术，更要靠文化的厚度。”宋笑珍说。

从黄河滩的普通石头，到承载地域文化的艺术品，宋笑珍的创作之路，既是对非遗的坚守，也是对传统艺术的创新。正如她所说：“我在石头上画的，是黄河的魂，是宁夏的根。”这份对土地与文化的热爱，让黄河石画在她的笔下，成为流动的历史与鲜活的传承。

本文所用作品图片均已注册版权

银川平原的湖沼变迁

汪一鸣

银川平原湖沼面积，在清代和民国时期达到历史最大值，其中，人为造成的渠间洼地湖占很大比重。这类湖沼普遍不深，但在不同季节的面积变化较大。它们原本或是农田，或是良好的草场，成湖后经济增值不高（或根本没有增值），却常给周围农田带来土壤次生盐渍化的严重后果。渠间湖沼的出现主要是灌区不合理开发的结果，是水利变成水害的典型例子。

在封建社会，人们无法限制平原水体过多所造成的消极影响，但创造了一些利用湖沼资源的有效办法。人们于部分高地种麦豆，部分洼地开沟种稻，对这些耕地加强灌溉洗盐，然后将盐水排入低洼处的荒地，由此形成了与农田交错分布的盐碱荒滩，形成了好地种庄稼、盐碱滩放牧、湖沼捕鱼割苇，这样一种独特的传统经营方式。

史载，明代中叶银川平原盛产菱、藕、荸荠、茭白、蒲笋、苇芽等水生蔬菜，并有天鹅、大雁、野鸭、鸳鸯、鸬鹚、鸥、鹭等水禽。当时的田赋制度规定，每年秋季，屯田军丁须于官湖（指所有权属于官府的湖泊）采运秋青草作为军马草料，其征赋数量竟为农田谷草的8倍。清末民初，以湖中芦苇、蒲草为原料加工的芦席、蒲纸是宁夏著名的外销商品。

夏日大雁湖。本报记者 李振文 摄

城市附近的湖泊，还常被开发为风景游览区。明代宁夏府城四周均为湖泊包围。在当地王公贵族的主持经营下，城东金波湖“垂柳沿岸，青阴蔽日，中有荷菱，画舫荡漾，为北方盛观”；城南南塘“地势低卑，每夏秋之交，加以流潦潋溃，与路旁明水湖混为巨汇”，后经垫路整修，“植柳千株，缭以短墙，注以河流”，于是形成了“杨柳夹堤，周道如砥，湖水浩浩然也”的壮阔景观，“菰蒲萍藻，鸥鹭鸟鱼，杂然于中。泛以楼船，人目之如西湖，居民喜为乐土”，成为当时银川城郊的著名风景区。

新中国成立后改一些水体为农田，是当时的人们有意识地改善环境的尝试，多数（主要是渠间洼地湖类型）发挥了巨大的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。这是因为，排水沟系统完善畅通后，许多渠间洼地湖自然疏干而恢复成田，灌溉余水有了出路，避免了严重水害。同时，土地盐碱化程度也大大减轻，不仅原有的农田产量猛增，而且在湖沼基础上建起来的大型国营农场，如灵武农场、青铜峡连湖农场、吴忠巴浪湖农场、银川西湖农场等，也都成功地发展起了稻旱轮作生产，增加耕地50万亩，粮食亩产达500公斤以上，为西北地区提供了大量商品粮。这些农场也是全国农垦系统中最早实现盈利的先进典型。

在西北干旱地区，水是最宝贵的资源。从水量平衡的角度分析，渠间洼地湖面积大而水深小，水分自然蒸发量极其可观。湖沼水分下渗部分也并未起到调蓄地下水的作用，反而使地下水位抬高至临界深度以上，咸化了一些地下水和土壤。将它们改为农田，大多为稻田，其全年水分损耗可大大减少，而生长季保持大气湿度、减轻干热风之类的生态效应却差异甚微。由此可见，在银川平原绿洲生态系统中，渠间洼地湖害多益少，疏干还田利大弊小。

然而，其他类型湖沼，如构造湖、扇缘湖和部分牛轭湖的情况则有所不同。首先，它们深度较大、蓄水多，一般水深1米到3米，有的深达5米，要排干改田比较困难。其次，它们成湖历史悠久，一般都处于地面沉降较多的地段，沉降的幅度往往抵消了泥沙淤积的幅度，从而有利于湖盆的保存。同时，其底质多为沼泽土、泥炭土、沼泽盐土或白僵土，水域饵料丰富，通过渠沟与黄河相通，灌排水易控制，常成为黄河中多种鱼类洄游、产卵、育肥、越冬的好场所。

历史上，银川平原是著名的“塞上江南”鱼米之乡，鲤鱼、鸽子鱼等美味脍炙人口，“村居多以渔为业”等诗句也反映了渔业的悠久历史与在当地经济中的重要地位。这些深度较大的湖沼所处地理位置也与渠间洼地湖不同，常成为滞蓄山洪、河洪的调蓄水库。可见其生态效应（防止水灾和调节气候）、环境美学效应（自然景观的多样化与美化）和经济效益都是明显的，而对农田次生盐渍化的不良影响则相对较小。

新闻热线：4012020 新闻投诉：6015303 征订电话：6010188 全年定价496元 本报地址：银川市解放东路143号 邮编：750004 广告许可证号：64010040002405 广告热线：6031733 6036433